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

杨艳萍 著

JINDAI ZHONGGUO SHANGXUE XINGQI YANJIU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工商大学专门史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

杨艳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 / 杨艳萍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141 - 1280 - 1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贸易经济 -
学术研究 - 近代 - 中国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453 号

责任编辑: 卢元孝

责任校对: 康晓川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王世伟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

杨艳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5 印张 300000 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280 - 1 定价: 2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门学科如果不自觉了解自身演变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中商学院众多，商学早已成为一种热门学问。但毋庸讳言，对于何谓商学，它究竟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等问题，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而且无论是商学界、还是史学界，都基本忽略了对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至于迄今，其历史面目依然模糊。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商学不仅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性、应用性和综合型的特点，还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清末民国学术实现初步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商学也曾经扮演过不容忽视的角色，对于深化这一时期学术与社会变革复杂性的认知，具有独特而典型的考察价值。

有鉴于此，杨艳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取近代中国商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对于清末民国时期这门重要学科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在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这部书，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认真增补和修订而成。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突出的贡献，是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搜集整理清末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商务和商学报刊、商学译著、论著和教科书等多种类型的文献基础上，比较扎实地梳理和总结了商学学科从引进、传播，到自觉构建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可以说首次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确立的过程与面貌，包括近代“商学”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其学科体系如何构建和走向社会化等等内容，进而分析了这对于进一步丰富认知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等历史问题的意义。我

相信,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学术史的认知,也能为当下的商学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从“商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知识传播角度,对戊戌以前西方商业观念和知识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进行了考察和讨论,指出以郑观应为代表的近代国人最早提出的“商学”概念,具有“商务之学”和商业学校教育的双重内涵。接着,对促发这一学科兴起的双重动力予以揭示,认为在“商战”、“学战”思潮的共同激荡下,引进国外“商学”的浪潮才勃然兴起。书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商学”输入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尤其是以译著为载体所引进的新式商学知识系统的整体状况,并对其时代特征做了说明,这构成成为全书的基础内容之一。

不过,《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最引人兴味的,还是对清末民国时期“商学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探讨。这也是该书核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中围绕着近代“商学共同体”的形成、运行,重点探讨了当时商学学术现代生产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水平,提出作为近代中国商学传播主体和载体互动的凭借,清末民初的“商务报”、以“商学”命名的期刊报纸和“商学会”等研究社团,它们与这一时期中国“商学”学校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过程相配合,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商学共同体”。作者无论是对京师大学堂“商科”的建立和演变的研究,还是对20世纪初商学研究社团和商学专业学者的探讨,都具有开创性。难得的是,除京师大学堂的“商科”外,作者还以上海商科大学等为个案,并兼及同一时期初、中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概况,深入地透视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的内涵和水准。通过这些考察,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商学学科已进入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之中的事实。

不仅如此,该书还系统探讨了近代国人不同时段界定的“商学”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演变,并通过剖析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国人编著的商学研究代表作(包括专业教科书和研究论著),以及“商学”学科术语从散播到定型化的历程,来综合把握和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情形,从而展现出那一代学人对该学科的学术自觉和认知程度。作者指出,商学在近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以“商业经济学”为核心,包括商业地理学、商业历史学等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型新学科,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应当说,书中这一部分

内容的研究，也很见资料功夫，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讨，奠定了可贵的学术基础。

总之，作者对近代中国商学学科的个案史考察，丰富和深化了今人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及其现代转型的认识，具有明显而实在的学术积累意义。同时，该书注意考察和分析该学科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显示出史学研究的特色。

当然，由于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书的研究，也难免存在自身的不足。比如，对商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多样性、冲突和张力，似尚可以有更多的反映，对于民国时期极为丰富的商学研究资料，也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搜集、补充的空间等。学术史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对历史研究者的耐力、学养和思想能力的挑战，永远也不会停止。希望作者今后能继续发扬实证精神，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相关探讨，为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2年2月29日

目 录

导论 近代中国“商学”研究刍议	1
0.1 商学：近代中国一门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	2
0.2 “商学”的界定与相关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	5
0.3 本书的研究路径与关注的问题	10
第1章 西方商业观念与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2
1.1 传统中国的商业观念与经商知识	12
1.2 传教士对西方商业观念和知识的早期传播	15
1.3 驻外使节和买办对于西方商业思想、知识的接纳与实践	23
1.3.1 普遍呼吁重视商业，由“商战”而疾呼讲求“商政”	24
1.3.2 郑观应率先提出具有双重内涵的“商学”概念	26
1.3.3 接纳和实践西方商业思想，经办最早的一批新式工商企业	27
第2章 “商战”、“学战”思潮与清末“商学”知识的系统传入	30
2.1 “商战”、“学战”思潮的奔涌与“商学”概念的流行	30
2.2 清末国外“商学”论著的输入及其所传播的系统商学知识	39
2.2.1 清末国外“商学”输入的历史概况	40
2.2.2 清末“商学”译著、编著所传播的系统商学知识	50
2.3 清末“商学”的社会化认同及其时代特征	57
2.3.1 “新学”目录书中之“商学”位置	58
2.3.2 制度化保障：商学教育体制的初兴	60
2.3.3 “商学”与“理财学”、“富国学”由混同到分野的演变	62
第3章 “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运行：以“商学”杂志与 研究社团为中心	68
3.1 “商学共同体”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构成	68

3.2 商业报刊的出现和商学专业期刊的建设	72
3.2.1 戊戌时期的开启商智与《工商学报》	73
3.2.2 新政前后“商务报”的成批出现	76
3.2.3 民国初年商学专业期刊的建设:以《商学杂志》为例	83
3.3 专业“商学”社团的诞生、发展及其活动	89
3.3.1 清末“工商学会”和各类商学会的诞生	89
3.3.2 商界人士主持的“商学公会”	91
3.3.3 民国时期专业“商学”社团的发展及活动	93
3.4 专门化商学学者的出现及其素质:总体认知与个别透视	98
3.4.1 清末民初专门化商学学者的出现	99
3.4.2 专门化商学学者的素质及职业取向	104
第4章 近代中国“商学”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112
4.1 京师大学堂“商科”的建立及其演变	112
4.1.1 戊戌至新政时期京师大学堂筹建章程中的“商务科”	113
4.1.2 京师大学堂“商科”正式开办之前的“理财”、“商政”教育	116
4.1.3 京师大学堂“商科”的正式开办	119
4.1.4 从北京大学“商科”到法科“商业学门”	122
4.2 清末“新政”时期各类商业学校的建立	127
4.2.1 商业教育在清末新学制中的位置	127
4.2.2 各级各类商业学校的初步建立	129
4.2.3 清末兴办的各类商业学校的特点及影响	134
4.3 民国时期的商学系、经贸系和上海商科大学	136
4.3.1 民国初年商业专门学校的建立及其课程规定	137
4.3.2 20世纪20~30年代的商学院系和“商学”专门化的发展	140
4.3.3 民国商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上海商科大学	144
第5章 清末民国时期“商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构建	152
5.1 “商学”概念的演变与学科知识体系的早期探索	152
5.1.1 “商学”学科概念的内涵及其定义演变	152
5.1.2 清末构建商学知识体系的可贵尝试:张相文的《商学》	155
5.2 民国时期的商学教科书和研究著作对商学学科的贡献	163
5.2.1 民国时期走向体系化的专业“商学”教科书	164
5.2.2 20世纪20~30年代“商业学”著作的涌现与成绩	168
5.2.3 民国时期商学其他各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	174

5.3 “商学”的学科术语体系：从散播到定型化的历史	186
5.3.1 早期“商学”译著中散播的商业新名词	186
5.3.2 “商务报”和商学译著中日译商业名词的出现与流行	188
5.3.3 《普通大百科全书》、《辞源》等辞书与商学名词术语的流播	192
5.3.4 20 世纪 30 年代陈稼轩的《实用商业辞典》与商学术语的 基本定型	196
结语 商学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198
学术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商学”的兴起	198
“实用”的悖论：社会基础的深层影响与学术制约	200
附录 1：清末民初商学著述及译著书目提要	203
附录 2：京师大学堂商科和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商科商业学门课程钟点	211
附录 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九“商业门”书目	214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7

图表索引

图 2-1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与贸易平衡状况 (1864~1911 年)	31
图 4-1	1928~1947 年全国专科以上商科在校学生数	143
图 4-2	1924~1936 年上海商科大学 (国立上海商学院) 学生人数	148
图 5-1	民国时期商学类著作概况	176
图 5-2	民国时期商学类著作不同年代出版趋势	176
表 2-1	清末“商学”译著汇总	46
表 3-1	清末各地商会主办报刊汇总	82
表 3-2	20 世纪 20 年代“商学”期刊统计	85
表 3-3	1914~1915 年官费留学生中商学学生数统计	101
表 3-4	1915 年 8 月至 1916 年 7 月全国商业学校、学生人数分布	103
表 3-5	1905~1911 年商学系留学生成绩	105
表 4-1	1903 年所订商科大学的课程设置	115
表 4-2	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理财”、“商政”课程内容	117
表 4-3	1912 年北京大学法科经济学门、商科六门课程	124
表 4-4	1917 年北京大学法科经济学门、商业学门课程设置	125
表 4-5	清末学制中关于初、中、高级商业学堂教育规定	128
表 4-6	清末全国各地初、中等商业学堂及学生人数统计	131
表 4-7	民国初年全国商业专门学校统计	138
表 4-8	国立南京高师附属中学校商科科目	145
表 4-9	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各系必修课程	147
表 4-10	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课程设置	150
表 5-1	清水泰吉著《商业经济学》与张相文编著的 《商学》章节目录对照	158
表 5-2	20 世纪 30 年代商业学代表作章节目录对照	169
表 5-3	北洋政府时期各种经济学术社团一览	179

导论

近代中国“商学”研究刍议

当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商学院”几乎都是各高等院校中最为火爆的院系之一。然而,与一些相对冷门的学科相比,商学学科的性质和内涵却更不确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商学科”表述为“Commercial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①,后修订为“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②,即研究探索交换(或交易)活动规律性和商业运行机理的学问。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历次发布的高等院校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却并无“商学”一科,国内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商学即商业学或商业经济学学科(也被称为“流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③,几经调整后,成为应用经济学下产业经济学的分支之一,隶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同时工商管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又从属于管理学学科门类,可见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此仍然定位模糊和难以界定,对这一学科的界限还未明晰。

并且,除了上述学科名称为业内和学界人士熟悉以外,当下有关商业流通领域的这一专门学科反而日益走向贫困化,这与现代商业流通迅猛发展的现实极不相称,甚至可谓背道而驰。实际上,商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是什么科学,国内至今仍没有比较确定和统一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以“商科”的实际存在而为社会所认知的。与其他体系成熟的学科相比,“商学”还缺乏严格的内涵界定和清晰的外延勾勒,仅仅是包括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等商业相关内容的

①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编,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译:《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②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 BPE-98/WS/1: 39。

③ 我国的商业经济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仿照“苏维埃贸易经济学”建立起来的,作为适应部门管理需要而设立的以“纯商业”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曾一度繁荣,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面临严峻挑战,促使学界对此学科进行过短暂的反思、回顾与重构,最终,1998年教育部专业结构调整后,由于在教学体系中不再具有独立地位,经过争取后只是在部分院校有所保留,在学科目录中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产业经济学二级学科的分支而存在,使得这门学科整体上开始萎缩,同时增加的管理学学科门类,开始设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此后,适应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陆续出现了“流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新的学科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学科泛称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至今国内商学界仍在困惑“商学是什么”,可这一学科也并非如有人较为缺乏历史常识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商学’一词,是近十年内出现的新称谓,它由‘商学院’的名称接引而来”^①,或者是学界目前较为普遍认同的“中国的商学理论与专业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②,而是至少已存在了上百年。可惜的是,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在商学界还是史学界,迄今都还缺少系统的清理,甚至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强调。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此种情形固属遗憾,却也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当然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挑战。

0.1 商学:近代中国一门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

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商学”概念在中国就已广为流布,成为时人所认同的“新学”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清末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以及1912年民国政府颁行的学制中,也都明确设有“商学科”、“商科大学”和商业专门学校,并详细规定了其学科门类和课程设置等。各大学商科院系或商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中修业合格者,还被授予商学学士学位,从而使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下来。据统计,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全国223所高等学校中,设有商学院、法商学院或商学系的,就达62所之多。^③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蓝本改造整个高等教育,在“苏维埃贸易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创建自己的商业经济学,从1952年起,商科教育体系被财经类教育体系取代,此后出现的两所独立设置的商学院,以培养政府商业部门人才为目标,与此前和今天理解的商科大学差别较大。到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综合型大学、财经类院校中才又逐渐恢复和重建起商学院,以培养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商业经济学一度曾颇为繁荣。而90年代末期,因经济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为部门管理需要建立起来的以“纯商业”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面临严峻挑战,学界对此的探讨进入反思、回顾与重构阶段,围绕着是否有必要创立一门新的适合商业发展的专门学科,产生了时断时续的争论。随后,与此时社会和学科发展需要相适应,学界陆续出现“贸易经

① 顾纪生:《国内商学教学:现状、趋势和改革》,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吴有根:《〈现代商学理论与营销管理〉序》,见吕庆华所著《现代商学理论与营销管理》,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③ 钱章录:《中国1949年全国解放时的高等商科教育简况》,见国内贸易部国际高等商科教育比较研究课题组、中国商业高等教育学会编:《国际高等商科教育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607页。

济学”、“流通经济学”等新的学科称谓。但在此过程中,商学学科体系和商学教育体系并没有得到整合和完善,恰是由于“商学概念的分歧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正是阻碍进一步展开商学体系研究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急需辨析商学概念,重构现代商学体系的根本原因”^①。

时至今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一门学科如果不了解自身发展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迄今为止,国内商学界对于商学学科定位的模糊,某种程度上说,与未能认真理清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乃至根本不知道自身曾经存在这样的历史,特别是对其知识体系的构建史认识不清有直接关系。这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日益重视本学科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即便从当今中国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揭示近代中国“商学”兴起和确立的全貌,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正本清源是也。通过认真细致地发掘近百年来“商学”发展的历史,或许可以为今天商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找到根据,至少给予一定的启迪,从而为今人更好地构建商学理论体系,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因而,可以说,商学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虽不长,却是近代中国一门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这是因为商学的兴起与时代紧密相连,与近代社会、经济、教育等的变革存在着复杂的历史互动,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作为应用性较强的综合型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它又具有着自身独特而典型的特色。因此,研究商学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不仅可以了解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转型重要组成部分的商学演进的历程,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重新认识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社会问题,从而深化对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转型复杂性的认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丰富的商业实践活动,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商经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商业观念与商业经营知识,但却始终是“贱商为不足学”^②,恰如王尔敏先生所说:“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此即轻商风气所影响最严重之恶果。”^③只有到了近代,寻求富强成为举国上下的重要思想主题之一,基于中外贸易逆差逐年扩大,新式工商企业兴办过程中华商不敌洋商的惨败教训,以及修订商约、改定税则等现实需求,社会各界才达成“商战世界即学战世界”、“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共识,汇聚成

① 杨琪:《关于构建现代商学体系的几点思考》,载《天津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周志群:《全球著名商学院商学特点》,载《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陈福颐编辑:《商业通论讲义》,载《南洋商报》第37期,1908年4月1日。

③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潮》,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开商智、兴商学”的舆论高潮,进而逐步引进西方现代商学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初步构建起商学学科和商科教育体系。

通过考察清末民初“商学”知识体系,及与之伴生的商科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可以看到此时西方商学知识体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已基本输入国内。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银学”、“数学”和“文字”为主的学徒技能训练,也与当代的理解有所差别,并且在逐步建立各级各类商业教育机构的基础上,以现代意义上的商学人才和各高等院校商科院系为中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学共同体”,为开展相关研究、沟通学术信息搭建起现代学术交流平台,从而与“商学”学校教育体制一道,共同将商学这一新兴学科纳入了现代学术机制,推动“商学”走向社会化。

从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来看,伴随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清末民初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可贵探索,有关各学科学术史的研究颇为兴盛,涌现出一系列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中,陈平原等人颇有见地的宏观研究,大致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思想演变的脉络,对近现代思想学术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剖析^①。黄兴涛教授提出的“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说,兼论了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以及此期涌现的大量新名词构成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现代平台”的观点和系列讨论,则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启示。^②近年一些学者就某一专门学科或特定学术流派的专题实证研究逐渐蔚为时尚,^③标志着有关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① 笔者所参考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论著主要有:陈平原:《中国近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2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和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②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载《开放时代》2003年4期;黄兴涛、胡文生:《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与动力问题》,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三联书店2006年版;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三联书店2006年版。

然而,作为近代中国一门长期存在、很有影响与特色的新兴学科——“商学”,却没有被纳入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过程中去考察,甚至这门至今仍然存在的学科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本身,也研究极少,以至于至今其面目仍然模糊。这与前述“商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可以说,除个别学者著文简要探讨了近代商业学校教育之外,有关近代西方商业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如何传入国内并生根发芽、形成学科的历史,长期以来却被忽略了。笔者相信,探讨近代中国商学之兴起,重构国人是如何在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观念和经商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移植西方商业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以增进对于“商学”学科历史的了解,也将能借此促进对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认知。

0.2 “商学”的界定与相关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

“商学”是近代中国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也是我们把握近代中国商学学科必须定义的一个关键词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之所以能够体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是同它们自身的构成内涵紧密相关的。”^①商学也是如此。作为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商学”究竟指什么,不能凭主观臆断,必须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阅读才能把握其历史内涵。在现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个商学的内涵,一方面是公司及商业机构的经营组织方法,一方面是会计、簿记、统计等数据登录的规则及原理。”^②但更多的学者,则在以下两层含义上来揭示这一近代新概念:第一,有关商业的知识、学问,即商智,包括通过译书、阅报、游历、经商实践等获得的所有商业知识;第二,特指商业学校教育。^③实际上,近代中国“商学”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大体说来,它是在包含上述两层含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的,由最初的泛称“商务之学”和商业学校教育等,渐渐演化为以“商业经济学”或“商业学”为核心,包容许多分支学科的现代商学知识体系。1915年出版的《辞源》就将其界定为:“商业上应用之学问,如商业专门学校及大学商科之各学科皆是。”^④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正是这一变化着的历史意义上的“商学”在近代中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的历史。

①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载《开放时代》2003年4期。

② 叶文心:《商业、职业与近代上海商界》,载《读书》2005年第10期。

③ 朱英、马敏:《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严昌洪:《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

④ 方毅等编校:《辞源》丙种,丑七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据笔者所见,现有研究中专门探讨近代中国“商学”的为数寥寥,与其他学科的学科史和近现代转型相比较而言,还基本处于被忽略的沉睡状态,仅仅在论述经济思想领域涉及重商思潮或“商战”观念等其他相关问题时,被有所涉及而已,而且常常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既是由于作为若干学科复合交叉的商学内容广泛庞杂,其目标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学科结构根据现代商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不断更新的缘故,所以至今为止学界对“商学”这一学科尚难做出严格的界定,实绝非偶然;同时,也是缘于有关近代“商学”的资料范围十分广阔,又比较分散,搜集起来十分费时费力之故。此前的一些研究之所以没有系统的突破,部分原因当在于此。因此,如果没有寻找到适当的角度,不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艰苦考察,不尽量把视野放宽,很难理清商学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的脉络。目前,国内商学界在讨论“商学”何去何从,或对其进行学科定位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清末民初那一代学人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和探索,与学科的割裂所造成的视野局限,或不无关系。

在现有的研究中,蒋建平等编著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值得重视。它是至今为止比较系统阐述我国近现代商业经济思想的论著,第一次对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进行了梳理。然而作为通史专著,它仅以各个时期人物思想为主的方法和体例,难以完整揭示和刻画出近代“商学”全貌,整体上尚缺乏学术史研究所需要的广阔视野。^①复旦大学1997届博士生丁孝智题为《中国现代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1919~1992》的毕业论文,在清理中国传统商业经济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经济思想开端,论述了此后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变化,但该文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商业经济学说在现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只是略微涉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现代商业经济思想史的源头,特别是清末民初颇为引人注目的“商学”言之不详。同时,由于研究角度的局限,上述两部著作并没有从学科史构建的角度,揭示出商业经济思想与近代社会、教育体制等存在的多元互动的复杂历史关联。^②此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谈敏、厉无畏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简单地提到商业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惜仅有寥寥几页,史料和论述十分有限,根本未能揭示近代“商学”包含的丰富内容。^③

① 蒋建平、柳思维、朱坚贞、曾赛丰编著:《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该论文2001年以《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为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刘佛丁的《中国近代工商制度的转变——中西工商制度比较研究论纲(下)》(载《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对近代中国商业经济和工商制度进行了研究,但也未从现代学术转型角度进行考察。

③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谈敏、厉无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尽管目前的有关研究尚缺乏学科史的自觉,但一些经济思想史的论著仍涉及了部分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内容,特别是近年来,在胡寄窗、叶世昌、马伯煌和赵靖等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叶坦、赵晓阳、程霖、黄忻强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西方银行理论和会计学在近代中国建立的论述,都就现代经济学、商学某一分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为我们了解近代商学兴起的状况做出了贡献,只可惜,它们均为一两篇论文,内涵有限,或未能充分运用翔实资料,或由于学科割裂导致视野受到限制。^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制史学者们的努力下,关于近代中国如何引入和建立商法学的研究相对来说可谓独树一帜,是研究较多的分支之一,并提出了较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②再有,就是一些关于近代著名人物,如张謇等人商业经济思想的个案研究等,^③虽仅仅是树木,而非森林,却也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于近代“商学”的认识。

就近代“商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动力性因素来说,现有研究中尚无专门论述。但近代中国“商学”的兴起,与晚清以来重商思潮、“商战”观念紧密相连,确是毋庸置疑的。学术界对该思潮已有过许多研究,不少学者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史籍中就不乏商业活动的记载,但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的倡导,使得长期以来形成轻工贱商的社会风尚,即使明清以来伴随商业经济的发展,个别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只有到了近代,在内忧外患加剧、国家财政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受西方和日本外来力量的冲击,朝野上下才形成“以商立国”、“商为国本”的共识,促使政府开始改变商业政策,以国家的力量大规模倡导发展工商业,进而筹谋创建商务学堂,培养适应新形势的专业商

①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经济”——WWW》,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赵晓阳:《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载《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程霖:《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忻强:《近代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载《广东审计》1998年第6期。

② 帅天龙:《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王志华:《近代中国商法百年(1904~2004)》,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黄清根、章扬:《张謇商业经济思想简论》,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2月;林家有:《试论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陈先枢:《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纪念谭嗣同殉难100周年》,载《重庆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陈礼茂:《张之洞的“商战”思想刍议》,载《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朱圆满:《梁启超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郭汉民教授指导,湖南师范大学2002届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